

“迟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

研讨会纪要

1987年12月25日，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召开了“迟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袁方主持了会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向会议提交了题为《迟发展效果与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制约条件》（本期另发——编者）的研讨提纲。与会同志就迟发展理论以及中国现代化的特点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因故未能到会的严立贤、园田茂人〔日〕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现将这些发言整理如下：

张 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

“迟发展”同现代化起步的类型（type）密切相关。所不同的是，前者从发展的时宜性（timing）来了解不同国家现代化起步的内部与外部条件，因而为现代化理论应用于研究特定国家现代化的特殊道路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很明显，这种观点同时吸取了现代化理论“内因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外部结构说”的成份，从而结束了现代化理论与“趋同”观念相联姻的历史，给不景气的现代化理论注入了一付强心剂。

但是，目前的各种迟发展（或“迟发效应”）的观点，多是集中分析发展的制约条件，还没有达到为切实的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基础的水平。而跨不出这一步，它就难以获得更多的响应者，因为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不是泼冷水，而是发展的设计方案。

从制定发展战略角度讲，我认为，“迟发展”最为重要的意义，是打破了人类经验中现有的发展逻辑性。这些逻辑性是从那些已经成功的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由于它们已经被历史经验所“证明”，自然也是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的逻辑依据——只是，这些国家必须首先创造好这些发展逻辑得以开始的条件。

然而现实的情况则是，这种已被局部历史证明了的逻辑本身，对于当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正是起步的障碍。西方工业化以来的人口增长大约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这一因素给机械化和都市化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与时间，使得工业化、都市化、人口增长三方面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人口暴涨只用了20年，人口成了工业发展的沉重负担。同样三个因素，在这里却成了相互促退的关系。日本“起飞”之时，最先进的科学领域是土木工程学，而广大第三世界步入现代化之时，它们所面对的却是宇宙工程学了。在这种情况下，先发展什么呢？依循过去的逻辑不会缩小发展的差距，而“倒着来”又可能是毫无用处的浪费，也难以符合国情。再如，西方的工业化从世俗社会发展而来，也就是说，它的以社会结构一定程度的分化为前提，而如今，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并不是对集中与分化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使对立的二者达到适度均衡，因为二者对现代化的效率都起着重要作用，它们相互“破坏”，又必须相互搭挡，西方的“因果”关系在这儿不能不发生倒转。现实的压力，迫使无数早熟的理论出台——它们又以历史经验的身份局限我们的实践。

所有这些“两难”，都向我们提出了发展逻辑的反省问题，究竟什么才是我们现代化的首要突破点？在这一点上，重构我们的发展逻辑看来刻不容缓。

景跃进（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我觉得对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研究可以从迟发与外发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应该弄清迟发与外发这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差别**。迟发概念侧重于现代化起步时间的先后序列及由此造成的**发展效应**。与此相对应的概念是早发。严格地说，绝对意义上的现代化早发国家只有一个，即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相对于英国来说，西欧其他诸国、美国以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均属迟发。可见迟发概念的外延十分广泛。外发概念重点在于揭示非西方社会现代化动力与外来文化传播的**关联**。与它对应的概念是内发。这两个概念以文化形态为基础，把现代化区分为两种类型：内发的现代化即指在社会结构内部自身孕育、生长和发展的社会变迁，外发的现代化即指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挑战而应战的社会变迁。把上面讲的**综合起来**，可以看出：外发型国家必然是迟发的，但迟发国家并不必然是外发的。作这种区分非常重要，至少可以给我们两个启示：一是西方国家迟发展效应与非西方国家的迟发展效应有着重大的差别；二是迟发展效应与外发效应是相关而又不同的发展效应。就前一方面而言，研究非西方国家的迟发效应必须与外发效应的研究结合起来，必须考虑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影响。非西方国家被纳入世界性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不平等秩序的形成过程。这种经历对于西方国家的迟发者是不存在的。后一方面与此紧紧相连：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起源于西方文化的全球性扩张。现代化的外发性，使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离开了原有的社会发展进程和轨道，社会变迁显现出特有的发展规律。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错综复杂的问题，如二元结构、文化脱序及由示范效应而产生的诸种矛盾。日本学者富永健一非常精辟地概括了非西方社会现代化面临的这两大特殊矛盾：外在的国际社会不平等结构与内部的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突。迄今为止的发展理论，其两大范型三大理论，实质上是这两个矛盾在理论上的逻辑表现形态。现代化理论立足于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而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则聚焦于国际环境的不平等结构和其制约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在的国际环境与内在的文化冲突都深刻地影响着它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应该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我想是否可以构造一个“迟-外发效应”的概念，来分析非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综合症”，便于说清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特殊处境。当然，这个概念的应用与“迟发展效应”的研究并不矛盾，二者其实是互补的。

第二个想说的是现代化外发国家的发展规律问题。前面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即外发国家现代化的特殊性。现在我们已经越来越重视这种特殊性，以此作为基点，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说明这种发展的特殊性，寻求外发型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显得日益迫切。我觉得仅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来说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以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显得不十分完备、周密和有力了。也许，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当初建立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来自他对欧洲社会历史，尤其是英国的研究。如上所论，这是现代化内发型国家的发展道路与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否能充分适合于外发型现代化国家呢？值得进一步思考。其实，马克思对于非西方社会在近代的发展进程有很深刻的见解。他对印度和中国社会的论述给人启发很深。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去挖掘。现在有一个想法，可能很不妥当。应该把社会发展区分为两种方式或形态：自然的发展形态与受外界强烈影响而变迁的形态。这两种发展形态显示的发展特点、方式与规律也许是不同的。当然，这两种发展形态并不完全相互排斥。在一个具体的社会中，二者可以相容，从而产生出几种新的发展特点。这仅仅是个想法。

最后要说的是，“迟-外发展效应”的研究必须与相应的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迟-外发展效应”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现代化道路上的特殊性，但对于非西方国家自身来说又具有相当的共同性，我们要在这个共性下面，进一步去挖掘、考察各国的特殊性。各国的情况不同，故在世界体系结构中的位置、状况也有差别，对外来文化挑战的回应程度和方式也不同。在方法论上，对外来影响的考察离不开对本身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的分析。因为传播文化之光要经过原有社会结构的折射才起特定的作用。这一点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当重要。

严立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我谈谈怎样理解“迟发展”及其对现代化的制约作用。按照一般理解，所谓迟发展，就是现代化起步较晚，而迟发展效果（即迟发展对现代化的制约）就是由现代化起步晚所引起的对现代化的种种制约作用。若按这种理解，那么只有英国和法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先发展国家，这两个国家在现代化开始的时候是不存在由迟发展引起的制约作用的。但是，事实上是，即使是英国和法国，在其现代化开始的时候也存在着一种制约条件，这个制约条件也是由“迟发展”所引起的。如果我们不是把“发展”理解为现代化，而是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发展，那么我们会发现，英国和法国也不能算是最先的先发展国家，最先的先发展国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自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后，葡萄牙和西班牙就开始向世界扩张。残暴的殖民掠夺，曾使葡萄牙特别是西班牙成为16世纪西欧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而此时的英国和法国要比葡萄牙和西班牙落后得多。也就是说，英国和法国要比葡萄牙和西班牙“迟发展”一些。显然，这种“迟发展”对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也会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因为当英国和法国开始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时候，世界的许多资源和市场已为葡萄牙和西班牙所占有，英、法已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经济发展的需要去侵略和霸占别国的资源和市场了。这就必然要引起战争。实际上，英国和法国真正开始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时候已经是17世纪了，即是在它们通过战争打击了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扩张势力从而克服了“迟发展效果”以后的事情。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一种固有意义上的现代化发展，而是一种封建色彩很浓厚的殖民扩张式经济发展，但是，这种经济发展对于其它国家的发展（无论是殖民扩张式发展还是固有意义上的现代化发展）确实产生了一种制约作用。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最初的对“发展”的真正的制约并不是表现为现代化的起步时间，而是表现为一种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占有程度。因此，如果仅仅从现代化起步时间晚来理解迟发展及其对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制约，未免太狭窄了一点。更为妥当的理解应当是从国家经济突破中世纪型的相对孤立的发展形式，从而形成世界性的资源和市场分配体系（最初表现为殖民体系）也即世界经济体系之初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来理解迟发展及其制约作用。也就是说，迟发展最初并不表现为现代化起步时间晚，而是表现为进入以资源和市场分配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较晚，从而使得对为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如资源、市场等等）的占有较少，并因此限制了现代化的起步及其发展。如果按照迟发展就是现代化起步时间晚，迟发展效果就是由现代化起步时间晚所引起的制约作用这样一种理解方法，现代化起步晚是原因，制约作用是后果，即制约作用是由现代化起步晚所引起的，但是，按照上面所说的理解方法则不是如此。按照上面我们所说的理解方法，应当是制约作用在先，而现代化起步晚在后，即制约条件在现代化起步以前就形成了。按照这种理解方法，除了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在形成世界经济体系之初最捷足先登的

国家以外，包括英国和法国的其它一切国家在其现代化还没有起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种制约作用在等着它，它们要想发展，要想开始现代化，就必须首先克服这种制约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迟发展”及其制约作用具有一种“乘数”效果。即是说，迟发展的制约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以一种指数级数的速度向上递增。当英国和法国开始现代化的时候，能对它们起制约作用的只有葡萄牙和西班牙，而当美国开始现代化的时候，其所面临的制约条件就要比英国和法国大。美国同英国和法国的竞争要比英国、法国同葡萄牙、西班牙竞争显然要困难一些。同样，德国的现代化所面临的制约条件又要比美国大。当中国和日本等一大批非西方国家开始现代化的时候，其所面临的对手是包括英、法、美和德国在内的一批先进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制约条件要比英、法、德、美等国家大得多得多。在现代化的起步时间上，中国和日本差不多是同时的。但是，日本能在当时的情况下集一切力量迅速地克服这种制约作用，而中国则是一拖再拖，始终未能克服这种制约作用，以致这种制约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克服。到今天，这种制约作用已成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大障碍。这的确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园田茂人（东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以富强社会为目标的迟发产业化社会（latestarting industrial society），在推进现代化之际，由于地球社会化（globalization），因而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了提高生产力，不得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但是，由于对于迟发产业社会来说，其现代化存在着输入异质的西方文化的一面，因而容易引起“本土派”和“西方派”对立。另外，在其初始阶段，仅从收入角度来看，也会出现比以前更显著的阶层间的、地区间的不平等倾向，从而产生排外主义的土壤，出现现代化的危机。因此，怎样“克服迟发性（management of backwardness）”，对于迟发产业化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以上论述同样适用于中国的现代化。因为中国也是一个迟发产业化社会，也必须实行开放和改革。以上提到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在中国如何表现，今后怎么变化等问题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

迟发展效果作为分析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视角，还可以引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结论。例如，迟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人为组织特征。迟发展国家和早发展国家相比，现代化过程的起步时间要晚，起步时整个社会发展的水平如经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化和组织化水平比较低，差距非常明显，由此造成迟发展国家在踏上现代化进程之时，一般都表现出来某种赶超型的目标或战略，即企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赶上或超过早发展国家。赶超的企望和落后的发展水平（以及其它因素）必然使得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为的过程，国家或政府则是这一人为过程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一般来讲，只有国家或政府有最终的权力支配和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有可能制定贯彻始终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创造为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各种社会条件。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由国家或政府组织的组织过程。日本、苏联及亚洲和拉美一些现代化发展较快的国家，都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特征。但同样明显的是，不同的组织过程也会带来不同的发展结果，有时甚至会成为现代化的制约条件或障碍，导致现代化进程的中断，这样的情况在世界上也不胜枚举。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的人为组织特征是同特定国家的许多其它因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更增加了迟发展国家选择时的不确定性。我认为，迟发展的这种效果，对于我们当前的改革和探索有中国

特色的现代化是有启发意义的。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国家的作用和职能问题，而改革以来一再出现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对国家作用和职能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更根本的是对这一迟发展效果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正因为这是一种迟发展的效果，所以，它既不同于早发展起来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国这样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来说，国家或政府对现代化过程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作用的恰当模式，是不可能在上述两类国家中找到现成答案的，在这两极中摇摆很有可能导致负的效应，这也许是迟发展效果这一新视角给我们的一种启示。

宋凤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探讨迟发展效果对我国现代化造成的制约条件，最终目的是要寻找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和对策。迟发展理论就是要指明现代化的“后来者”所处的不同于当年“先来者”的不利的国际环境或世界体系，以及这种局面给迟发展国家带来的强大的政治压力、不利的经济地位和复杂的文化冲突，这一切使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不仅困难重重，而且不能走西方的老路。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必然的逻辑。但是宣布进行现代化建设，也就意味着加入国际竞争，为了跳出“马太效应”的恶性循环，也必须寻找不同于自己本身过去的老路的新路。迟发展国家纷纷改革传统经济体制及政治体制，就是想从内部结构上寻找自己的出路。而内在机体的适应力、竞争力能否达到“最佳竞技状态”，是能否成功的最后根据。迟发展不是不发展，日本、俄国成功了，与我们更加接近的迟发展国家如新加坡、南朝鲜也发展很快，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大大缩短。关键是激发内在活力。

于长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由于存在着迟发展效应，所以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独裁或民主不能简单地进行理想化的判断。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不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而是迎接外部挑战的结果，因此它往往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人为”的过程。政府——无论何种形式——都必须首先维持自身的存在，然后动员社会各种力量从事现代化建设。维持政府存在与动员社会力量这两者之间往往是矛盾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同一时期面临着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问题，如人口、贫困、高犯罪率、种族冲突、阶级冲突、人才外流、外债、民主化要求、污染、国防建设、科技落后……等等，这些问题在发达国家历史上是依次出现、又依次解决的，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同时并存，这使本来就效率不高的政府穷于应付，捉襟见肘。尽管这样，政府在同一时期只能集中精力解决一小部分问题，大多数问题不但不能解决，甚至有可能激化。社会成员一方面不满于本国的落后和贫困，另一方面又不理解或不承认本国落后和贫困的复杂原因，所以很容易把种种社会现象人格化，产生一种宗教式的愤怒或崇拜，这些情绪达到某一临界值，就会导致对现政府合法性的否定，并提出改组政府或改革体制的要求，从而引起社会动荡甚至解体。

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一个重要的迟发展效果就是经常性的权威危机，如何确定政府合法性和权威性，成为政府——无论由什么人组成的政府——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在发展中国家，传统型权威由于深深打上了封建主义、殖民主义烙印而遭到批判，法理型权威又缺乏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仅能做为一种理想而存在，更多地被当成政治斗争的旗帜；唯有克里斯马型（个人感召型）权威得以发展，成为通向权力的最有效途径，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夺取政权往往靠军事政变，维持政权往往靠独裁，这是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性的。

孙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

一、迟发展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普遍经受的挫折感是迟发展效果在心理层面上的反映。

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给迟发展国家造成经济、社会和政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压力，这些国家的政府为加速本国现代化进程，只能制订出宏大的目标以动员全社会资源，但很快受到国内有限资源的限制，感到不能满足国内与日俱增的欲望（如消费欲望、工资待遇、社会福利和民主政治的要求等），于是被迫制订出名目繁多的条款，采取行政命令抑制需求。这样做的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迟发展国家人民心理上的挫折感。

另一方面，政治上刚刚独立或感受到落伍危机的迟发展国家政府，由于受时间的限制，其推进现代化的政策大多在尚欠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出台，使之难免不带有缺陷，故在政策实施时，往往容易受挫，这样，给国内的保守势力提供了抵制改革和新生的事例。政策受挫的结果，最终影响了政府的权威性，使迟发展国家的政府和它的人民一样，时常遭受挫折感的袭扰。在这种袭扰之下，政府的决策明显趋向于谨慎。谨慎的决策，延缓了国内人民的需求满足以及需求满足的程度，其结果又加深了人民已有的挫折感。

二、政治需求的不平衡性。

迟发展国家大多不是“法理社会”，尤其在处于东方文明圈内的迟发展国家，人与人之间定带有特殊性的人际关系，对外人普遍持不信任与不合作态度。在经济方面，这种态度使具有契约合同性质的经济关系难以建立；在政治方面，人民对自己的政府缺乏应有的合乎理性的信任感。因此在受到发达国家的示范时，这些迟发展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从本质上看不是一个自然的演进过程，而必须靠国家力量进行持久的公民普法教育。但旨在普及法律常识的教育，往往唤起了国内知识分子阶层强烈的政治民主化愿望，使政府面临两难选择的困境。

三、应具体分析迟发展效果的变异性。

挪威学者Johan·Galtung提出了发展理论中的“中心论学说”。他提出：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是发达国家，边缘是不发达国家，边缘国由于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形成了单一的经济结构，生产的产品只有运往中心，导致对中心国的依赖性增加，同时，边缘国因此而难以脱出圈外。

但需指出的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加上美国的对华禁运政策，中国有幸摆脱了中心圈，30多年经济建设，国内初步建立了独立工业体系。现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无疑会对我国工业化产生影响，但同时这种示范效果也受到国内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制约。因此具体分析示范效果的变异性，揭示具有独立工业体系的边缘国家与中心国新的互动关系为我们带来的发展契机，很有意义。例如Sengels指出，当边缘国退出圈外，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之后，再回到圈内，可与中心进行选择性的合作。

贺涌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

在我们讨论各种各样的迟发展效果的时候，不能忽视社会政治方面的迟发展问题。当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开始启动时，早发展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文化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大众政治早已确立并稳定高效地运行了；而在迟发展的国家里，传统政治势力还异常强大，中产阶级力量弱小，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人民群众普遍缺少参与的传统和能力。尽管早发展国家民主制度的确立作为一种内生的自然演化过程，经历了两、三个世纪，但其结果却对迟发展国家产生一种示范作用，驱使人们超越客观条件、跨越时间历程，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提出激进的要求。南美的一些国家，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由于缺乏存在的条件，不久

便代之以更为专制的军人政权。

就我国来讲，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很不发达而封建主义依然坚固的基础上发生的，在我们以往的社会政治文化当中，封建的成份很大，其中突出的是家族制度、专制主义及其伦理规范，予以肃清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也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多元化的社会环境，没有进行必要的公民训练。今天，由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有些地方甚至还解决不了温饱的问题，还必须发展组织化的力量。

由于迟发展国家与早发展国家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条件等方面的差距，作为迟发展国家的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不应、也不可能操之过急，一定要尽可能避免在这方面出现反复。我认为当前一件迫切需要做的事情，是建设和传播我们自己的现代社会政治文化。没有这样一个条件，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政治是不会有坚实的根基的。

韩明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研究迟发展的问题，我觉得还可注意这样一些问题，比如：（1）还是要从不同社会的性质和历史的发展来分析这个问题。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走在资本主义发展前列的帝国主义国家，把世界弱小国家的土地都瓜分完了，引起世界大战。后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就不如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么容易。二次大战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谓南方国家）在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魔爪下，想搞现代化更加困难。离开这个背景分析问题，就可能得不到正确的结论。（2）我们也是“迟发展”国家。我们正走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黎平整理）

责任编辑：严立贤

· 小资料 ·

广东省的涉外婚姻

涉外婚姻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外籍华人结婚；一个是国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内地人结婚。广东省涉外婚姻登记在全国占首位，从开放前每年一、两千对到现在每年一万多对。改革、开放九年我省总共办理了涉外婚姻登记 97 376 对。其中外国人、外籍人 671 对；华侨 1 866 对；港澳同胞 10 267 对，其中不少是英籍人。1986 年共办理登记 12 835 对，是比较多的一年，预计 1987 比前一年又要增加。

据统计在广东申请结婚的外国人、外籍华人、华侨来自五大洲，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尤以美国最多，其次是英国、加拿大。还有一些与我国尚未建交的国家，如南非等一些朋友和华侨也克服各种困难来我国结婚。

关于婚龄，70 年代国外或港澳同胞一方年龄一般比较大，而国内一方年龄比较轻，形成双方年龄悬殊。近几年来，国外和港澳同胞一方，年轻人逐步增多了，如 30 岁左右的人占申请结婚人数的 50% 以上，近年还出现既嫁姑娘、又娶媳妇的平衡性转变过程。同时据了解广东的涉外婚姻离婚率较低。

（周杏开）